

第二章 历史上岭南滨海地域的生计模式

在两汉以前，合浦地区已经和东南亚及南亚发生贸易交流，同时也向中原地区缴纳贡品，虽然没有确切的路线，但是却表现了合浦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水运交通发展具有良好的基础。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军攻略岭南地区，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在这一过程当中，为了运输军粮而开凿灵渠，使合浦地区通往中原的水运交通线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条线路也是合浦地区历代通往中原最重要的水运交通道路。两汉时期，合浦以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之前代对该地区的开发，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贸易日益繁盛。水运交通线路不断发展，与西南地区、中原地区联系密切，同时通过沿海航线已可到达今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并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发生贸易。这一时期合浦的军事、贸易地位在岭南极为突出，大量来自中原的汉人开始进入合浦地区，从而促进了合浦地区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南北战乱，合浦通往中原的水运交通线路受阻，加之航运技术以及造船技术的提升，以及南朝政府对于采珠业的严格控制，合浦在这一时期海外贸易地位逐步让位于广州，但在军事层面上依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多次对交趾的用兵均以合浦为军事基地。隋唐时期，合浦的水运交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灵渠的重新凿通，使合浦恢复了与中原地区的水运交通线路，同时由于“天威遥”的凿通以及全国性的沿海航线的开通，合浦沿海水运交通更为发达，已可到达辽东半岛。在这一时期，合浦依然是岭南地区的军事重镇。

宋元以后，由于合浦港以西钦州港的兴起，以及出入交趾的陆路通道网络的确立，合浦港在西南沿海地区的作用不再突出。加之合浦所依托的南流江淤塞问题愈发明显，合浦港遂泯然于众小港口之间。到了明清时期，南流江主航道州江出海口的淤积愈发严重，使得船只无法进入合浦港的中心——廉州镇，到明代中期廉州镇已没有出海口，其所称合浦港实际为冠头岭一带的北海港。

一、渔盐与明珠：合浦滨海生计的基础样态

岭南滨海地域水产品丰富，晋刘欣期《交州记》载：“有一湖去合浦四十里，每阴雨日，百姓见有铜船出水。又有一牛在湖中，以鸡、酒为祭便大获鱼。”^[1]某些鱼类甚至被社会上层人士视为珍馐，《南方草物状》载：“短头细黄鱼，以九月中因秋风而变成鶉。上圃吏民捕取，盐炙食，滋味肥美，出交趾、合浦郡。”晋刘渊林注左思《吴都赋》“鼃鼃鲭鰐，涵泳乎其中”时提到“鲭鱼，出交趾、合浦诸郡”^[2]。梁武帝萧衍之弟萧宏奢侈异常，“后庭数百千人，皆极天下之选。所幸江无畏服玩侔于齐东昏潘妃，宝屨直千万。好食鲭鱼头，常日进三百”^[3]。可见鲭鱼颇为社会上层人士所重。滨海地域除丰富的鱼类、蛤蜊、螺等水产外，也不乏水草、藻类，不少可佐食。《南方草木状》

载：“绰菜，夏生于池沼间，叶类茨菰，根如藕条。南海人食之，云令人思睡，呼为暝菜。”^[4]《异物志》云：“石发，海草，生海中石上。丛生，长尺余，大小如韭，叶似席莞，而株茎无枝。以肉杂而蒸之，味极美，食之，近不知足。”^[5]

滨海地域海盐生产较为便利，“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6]，岭南所出主要是海盐。从文献记载上看，岭南滨海地域大多出盐，据《汉书·地理志》载“番禺，尉佗都，有盐官”^[7]，汉代“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8]，番禺近海，于其地置盐官当是海盐产地。唐代，潮州海阳县有“盐亭驿，近海，百姓煮海水为盐，远近取给”^[9]，恩州所产红盐“色如绛雪”^[10]，新会县“南二百六十里海中上川洲、下川洲……有盐田，土（人）煎盐为业”^[11]。罗州（治所在今廉江市）“郡傍海，海有煮盐场三，然郡民盗煮，亦不能禁”^[12]。岭南地区广泛存在煮海水制盐，“野煎盐，广南煮海，其无限，商人纳榷计价极微”^[13]。这类小规模制盐政府并不限制，管理也十分宽松。广西滨海地域煮海水制盐历史悠久，南朝宋时，吴郡人张融浮海至交州，曾作《海赋》，自注：“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14]这里描述的就是交州地区煮海水制盐的情形。萧齐政权曾在越州（治所在今浦北县）增设“盐田郡”^[15]，地望约在今北海市铁山港区，当是官办海盐产业，此后北海一直有盐场。南汉政权在今合浦县石康镇及其周边地区置常乐州，领“博电、零绿、盐场三县”^[16]，可见合浦地区是海盐的重要产地和内销口岸。

岭南滨海地域平民除部分编户民以及避役流民外，主要为不完全纳入编户系统的以海洋作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各类夷民，他们被称为俚人、越人、乌浒、越龟、蜃户、蟹户、卢亭户等。岭南滨海地域有鱼、盐、珠玑、香料等之利，“越人美羸蚌而简太牢”^[17]，水产品是百越之地食物的重要来源，滨海地域更是如此，钦州“别有夷人，名高梁人，不种田，入海捕鱼为业”^[18]。阳江县海陵岛一带，“回环三百里……此洲乃百姓鱼盐之地也”^[19]。新会县有“蜃户”，“生在江海，居于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业。若居平陆，死亡即多，似江东白水郎也”^[20]。这些滨海地域夷民一般不从事耕作农业，他们以船为家，居无定所，捕捞鱼等水产作为主要食物来源，同时从事煮盐、采珠、采香等产业。滨海地域不适合发展耕作农业，而捕获水产品为食通常情况下难以解决温饱。东汉杨孚《异物志》载：“甘薯似芋，亦有巨魁，剥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专食以当米谷。”^[21]《南方草木状》记载珠崖等地好食“薯蕷之类，或曰芋之类。……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惟掘地种甘薯”^[22]。种芋、薯等毕竟产量不高，只能暂时解决口粮问题。

由于农业生产较为落后，滨海地域平民无论单一从事捕鱼、煮盐、采珠、采香还是兼而有之都很难实现自给自足，因此通过对外贸易获取粮食、铁器、布匹、酒等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成为滨海地域经济形态的重要特征。东汉杨孚《异物志》载：“乌

汧，取翠羽、采珠为产。”^[23] 乌汧“取翠羽、采珠”主要用于交换，东汉顺帝时，“（孟）尝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24]。西晋陶璜上疏中提到：“合浦郡土地硠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25] 唐代陆州（治乌雷县），“州在穷海，不生菽粟，又无丝绵，惟捕海物以易衣食，盖岛夷卉服之也”^[26]。自古以来，合浦等地“夷人号越？，多采珠及甲香为业”^[27]，采珠、采甲香等主要是用于交换米谷等生活必需品。生活在广东、福建滨海地域的卢亭人，“在海岸石窟中居止，初亦无定处，三四口共一小舟，能没入水数丈，过半日乃浮出。形骸饮食衣着非人也，能食生鱼兼取蚬蛤海物，从舡人易少米及旧衣以蔽体”^[28]。卢亭人好酒，往往以斧楔取蚝壳，“挑取其肉，贮以小竹筐，赴墟市以易酒”^[29]。卢亭人通常驾舟捕捞鱼及其他海产，除食用外还用以交换米、酒、布等。滨海地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商品交易市场——鬼市，唐代施肩吾诗云：“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年少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30] 诗中生动表现了滨海地域的鬼市与采珠活动。唐代郑熊《番禺杂记》载：“海边时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从之，多得异物。”^[31] 可见鬼市交易商品中不乏奇珍异物。“百粤之地，其俗剽轻，猎浮淫之利，民罕著本”^[32]，对于滨海地域平民而言，这种选择是迫不得已的。

东汉以来，将活跃在滨海陆地、海中及海岛上肆行劫掠的反政府武装称为海贼、海虏、海寇、海盗、岛寇、倭寇、倭夷等。汉唐时期，岭南海贼成分较为复杂，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军攻破番禺，南越国吕嘉、赵建德“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33]。吕嘉、赵建德等作为政治斗争失利者，不得不逃亡海上以谋生路。孙吴宝鼎二年（267年），华核上疏孙皓时提到交州局势危急，“交州诸郡，国之南土，交趾、九真二郡已没，日南孤危，存亡难保，合浦以北，民皆摇动，因连避役，多有离叛，而备戍减少，威镇转轻，常恐呼吸复有变故。昔海虏窥窬东县，多得离民，地习海行，狃于往年，钞盗无日”^[34]。可见孙吴后期交州山寇繁炽，滨海地域流动海贼众多，他们既有逃避赋役的编户，也有当地土著，已经严重威胁政府统治。东晋义熙六年（410年），刘裕展开针对占据广州等地的卢循势力集团的军事行动，卢循不敌，“循乃袭合浦，克之，进攻交州。至龙编，刺史杜慧度谄而败之”^[35]。朝廷虽然平定卢循势力，斩卢循及其二子，传首京邑，但一时散溃不等于完全荡平。

广东、福建滨海地域有卢亭人，“卢循背据广州，既败，余党奔入海岛，野居”^[36]。可见卢亭户与卢循部众有某些渊源，他们奔入海岛，基本上脱离了朝廷控制。萧梁时期，广州中外商贸有所恢复，至萧励为广州刺史时，外国舶岁十余至，而“俚人不宾，多为海暴”^[37]，这里所说的“海暴”应当是指俚人劫掠外国船舶商货，沦为海贼。唐代广州生活着众多波斯、阿拉伯等外国商民，武后光宅元年（684年），广州胡商不堪官吏侵渔，诉于都督路元睿，路元睿偏袒属吏，“群胡怒，有昆仑袖剑直登听事，杀元

睿及左右十余入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38]。乾元元年（758年），广州大食人、波斯人暴动，攻入城内，“劫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39]，这里虽没有以海贼称之，但从部分胡商攻击官府、劫掠府城，最后浮海逃亡来看，应该有沦为海贼者。生活在“广、容之南，邕、桂之西”^[40]的西原蛮，“地数千里，种落甚众，乾元以来累为叛乱”^[41]。天宝初，“黄氏强，与韦氏、周氏、侬氏相唇齿，为寇害，据十余州。韦氏、周氏耻不肯附，黄氏攻之逐于海滨”^[42]。这场叛乱蔓延广西大部，“黄贼皆洞僚，无城郭，依山险各治生业”^[43]。从“逐于海滨”来看，滨海地域的世居居民与海贼很有可能卷入这场纷争。广西钦州有“僚子，巢居海曲，每岁一移。椎髻凿齿，赤棍短褐，专欲吃人，力得一人头，即得多妇”^[44]。僚子生活在海湾地带，不从事农业生产，应当是以捕鱼为生，适时劫掠商旅。唐代后期，官吏贪残、强赋于民以及南诏累次进攻邕管等地导致邕、容两管内乱迭出，十室九空。南汉时期，岭南西部滨海地域海贼猖獗，一度使合浦等地通往交州的海道中断。南汉乾和十二年（954年），交州吴昌浚向刘晟称臣，“（刘）晟遣给事中李玓以旌节招之，玓至白州，浚使人止玓曰：‘海贼为乱，道路不通。’玓不果行”^[45]。

西汉中期以前，“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46]，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力量深入改变了这种较为平衡的局面。东汉后期，交趾“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47]。官吏贪残，吏民怨叛，包括滨海地域在内的岭南地区一直饱受其害。《南方草物状》载：“短头细黄鱼，以九月中因秋风而变成鹑。上圃吏民捕取，盐炙食，滋味肥美，出交趾、合浦郡。”^[48]汉末交州刺史朱符“多以乡人分作长史，侵虐百姓，强赋于民，黄鱼一枚收稻一斛”^[49]，此种行径与掠夺无异。滨海地域平民在资源争夺与控制中逐步处于下风，据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言：“合浦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岁，使教入水，官禁民采珠，巧盗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50]孙吴严格限制民间自发采珠，“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51]。朝廷征调繁巨，大肆“截取供办”包括“名珠”在内的各类奇珍异宝，这种竭泽而渔式的剥削同样导致百姓饥困。唐广德二年（764年），镇南副都护宁龄先上言：“合浦县海内珠池，自天宝元年以来，官吏无政，珠逃不见。”^[52]唐代廉州并不贡珠，而《岭表录异》载：“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谓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贡，自监珠户入池，采以充贡。”^[53]这显然属于“逾意外求”，重赋于民，正如王建《海人谣》中所言：“海人无家海里住，采珠役象为岁赋。”^[54]俚民帅也大多贪婪，“大帅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55]。直到宋代，合浦采珠“蚕家不善为价，冒死得之，尽为黠民以升酒斗粟，一易数两”^[56]。采珠、香、珊瑚人在奇珍异物采捕、加工、运输、交换等环节处于从属地位，他们大多“寒而无衣，饥而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57]，能够从鱼、

盐、香药、珠玑之利中致富的平民少之又少。汉成帝时，王章得罪大将军王凤，死于狱中，妻子和儿女流徙“远湿难处，水土不同”^[58]的合浦，因善于经营，很快“采珠致产数百万”^[59]。唐代宗时，新州人何游泰为躲避政治灾祸，“与妻子客寓合浦，为采珠徒长”^[60]，也通过采珠积累了许多财富。王章本是朝中权贵，何游泰之兄何游鲁为泷州首领，他们均不是滨海地域世居之民，他们的致富经历仅是精英阶层异地谋生的杰出代表，不具有普遍性。

滨海地域平民大多非编户民，也非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但在获取生活资料方式不稳定及朝廷、地方权贵等剥削、掠夺的情况下，生活境况很差。隋文帝在统一岭南后的《安边诏》中说：“岭南之地，涂路悬远。如闻凶魁赋敛，贪若豺狼，贼署官人，情均溪壑。租调之外，征责无已。一丁年科，甲一具，皮毛铁炭，船乘人功，殊方异物，千端万绪。晨召暮行，夕求旦集，身充苦役，至死不归。”^[61]这份诏书直言此前由于官方索求无度导致岭南地区百姓不堪重负。《隋书·食货志》载：“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乐输亦无定数，任量，准所输，终优于正课焉。”^[62]虽然岭外少数民族享受“优于正课”的待遇，但地方官吏、土豪酋帅贪残而治使得包括滨海地域在内的岭南地区治安较差，唐太宗《安抚岭南诏》称：“广州管内，为弊尤甚，蛮夷草窃，递相侵掠，强多凌弱，众或暴寡。”^[63]可见岭南局部冲突不止，恃强凌弱较为普遍。唐代“合浦则蛮之犷俗，相尚战斗”^[64]，民风彪悍从侧面反映出生计艰难下滨海地域平民为求生存而斗争的历史事实。

二、造船业：合浦的基础制造业

造船业始终是岭南海外贸易的支撑。先秦时期，岭南越（南越、西瓯、骆越等）人面对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地形及河流众多、江海连通的环境，形成了渔猎山伐辅以商贸的生计模式，造船、行船自然成为土著越人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容。汉人对岭南便于水、越人善操舟有较为深刻的印象，《淮南子·原道训》云：“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绁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65]造船、游水是百越族群生活常态，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66]。岭南越人善于操舟，左思《吴都赋》云：“篙工楫师，选自闽禺。”^[67]东汉繁钦《辨惑》曰：“吴人者，以船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庚。”^[68]所谓“夷庚”即藏车之所，可见孙吴造船业之兴盛，越人“习于水斗，便于行舟”^[69]的说法殆非虚言。

岭南地区林业资源丰富，不乏造船良木。晋代郭义恭《广志》曰：“桂出合浦，而生必以高山之巅，冬夏常青，类自为林，间无杂树。”^[70]汉代《上陵曲》云：“桂树为君船，青丝为君竿，木兰为君棹，黄金错其间。”^[71]唐代陆龟蒙《引泉》诗云“凌风振

桂柁，隔雾（一作‘霞’）驰犀船”^[72]，可见桂树是很好的造船材料。交州所产榑木也可用于造船，晋代刘欣期《交州记》载：“槽，赤色，堪作船、作床。”^[73]郭义恭《广志》云，“（柯树）生广南山谷，波斯家用木为船舫者也”^[74]，可见岭南柯树适合制造海船，且在国际上有一定的知名度。岭南枕木也是制造海船的重要木料，唐代陈藏器有言：“枕生南海山谷，作舫船次于樟木。”^[75]这里所说的舫船概指海船。据《异物志》载：“梓椌大十围，材贞劲，非利刚截不能克，堪作船。”^[76]钦州海山所产乌婪木，做大船之舵，极天下之妙，“虽有恶风怒涛，截然不动，如以一丝引千钧于山岳震颓之地，真凌波之至宝也”^[77]。

汉代岭南已能建造较为复杂的大中型客（货）船，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番禺令唐蒙从南越国处得知有一条从夜郎国经牂牁江直达番禺的水道，“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78]。航行于这条辗转绵延数千里的水道显然不是独木舟之类的小船能够实现的。从贵港、广州等地出土多件汉代陶船看，岭南地区已能建造大中型客（货）船。贵港梁君垌14号汉墓出土了一艘东汉晚期陶船，“船体长条形，首尾狭，中部较宽，底平。船内分前、中、后三舱，船上有俑15个。是一艘大型的内河航船，结构复杂”^[79]。广州先烈路5080号汉墓出土东汉晚期陶船与贵港陶船类似，“船体长条形，首尾狭，中部较宽，底平。船内分前、中、后三舱。船上有俑6个，有部分甲板，有舵、锚和‘梁担’装置”^[80]，是一艘大中型客货混载的内河航船。贾岛《送张校书季霞》云“从京去容州，马在船上多”^[81]，所乘当是这类客船。为满足租赋转运需要，汉代岭南已出现大型运输船，东汉建初八年（83年）大司农郑弘鉴于“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峽道”^[82]。东汉初，交趾刺史部辖苍梧、南海、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贡赋皆经海道由东冶（治今福州）转运，各郡建造大型内河、海上运输船自然理所应当。《史记·郗生陆贾列传》载“蜀汉之粟方船而下”，《索隐》于此案曰：“方船谓并舟也。”^[83]由于舫船是多舟相并，载重量大，稳性较好，已成为常用军事运载工具，汉代岭南等地贡赋转运有可能也是使用舫船。唐懿宗时，陈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84]，可见唐代岭南千石海船较为常见。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广州等地所造远洋海船经常遭遇海难，据《中国印度见闻录》载：“去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经常遇难，或者船上的人被抢劫，或者船只被迫作长期停留，因此他们不得不把货物在别处销售，而运不到阿拉伯地区。”^[85]可见，中国所造远洋贸易船舶主要活跃于东亚和东南亚海域。《唐语林》称“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86]，拥有大型河船、海船，能够从事大宗贸易的主要是富商。

岭南居民从事捕鱼、采珠、采香等与生计密切相关的活动需要建造小艇，内河公私商旅离不开客（货）船，通过海路开展政治、军事、商业、人文交往则需要稳重巨

舶。岭南所造船舶类型多样，包括独木舟等小船、大中型客（货）船、大型海船以及各种战船。其中，使用频率最高、数量最多的当属独木舟、竹筏等小艇。晋裴渊《广州记》载：“土人伐船为业，随树所居就以成槽，皆去水难远，动有数里……”^[87]土著善于就地取材，于临水多木处建造独木舟。据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载：“广西江行小舟，皆剡木为之，有面阔六七尺者。虽全成无罅，免濡枷之劳、钉灰之费，然质厚迟钝。忽遇大风浪，则不能翔，多至沉溺。”^[88]可见直到宋代，广西内河行船仍然普遍使用独木舟，一方面与独木舟取材方便、建造工艺简单、渗（漏）水概率低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本地铁、桐油等不易获取，建造大中型船舶较为困难的反映。西晋初，交州刺史陶璜奏称：“南岸仰吾盐铁，断勿与市，皆坏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战而灭也。”^[89]交州社会生产较为落后，盐、铁仍然依赖岭北等地供应。此后，岭南海盐生产逐步发展，而铁仍为稀缺资源，《广州记》曰“邓平县有铁”^[90]，西晋广州苍梧郡有鄣平县，此“邓”当为“鄣”之误。怀集县东北四十二里有骠山，“多铁铆，百姓资焉”^[91]。鄣平县、怀集县等地虽有铁，但产量有限，“深广沿海州军，难得铁钉桐油，造舟皆空板穿藤约束而成”^[92]。可见，直到南宋时期，岭南沿海地区船舶建造仍缺铁钉、桐油。岭南多竹，其中粗大者可以破为竹筏，刘恂《岭表录异》载：“贞元中有盐户犯禁，逃于罗浮山，深入第十三岭，遇巨竹万千竿，连亘岩谷，竹围皆二丈余，有三十九节，二丈许。逃者遂取竹一竿，破以为竹筏。”^[93]这类载重“二百斛以下”的小艇可以满足居民日常出行、运输、商贸的需求。唐德宗贞元年间，王锬任岭南节度使，“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94]。虽然这类小船实用性强，但是稳定性差，常有倾覆之虞，无论是内河还是海上行船，风浪对人、船、货物安全均构成极大威胁。

岭南沿海、沿江各处不乏“随树所居，就以成槽”者，而船舶属于消耗品，西晋将领王濬上疏平吴时提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95]，新建、修补各类船舶很重要。唐代“淮南篙工不能入黄河。蜀之三峡，陕之三门，闽越之恶溪，南康赣石，皆绝险之处，自有本土人为工”^[96]。表明不同水域行船需要熟悉该地水情的船工，不同的水域最好使用本地所造船舶，刘晏有言：“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97]南宋戴埴询问海篙工海防事宜，海篙工回答，“北舟皆枣，诸杂木遇咸水多湿且重滞”^[98]，内河行船与海上航行在造船原材料选择上是有所侧重的。汉唐时期，岭南各地造船业较为普遍，港口内外贸易、征收租赋（土贡）转运、水军作战，促使广州、合浦、徐闻、梧州、贵港、韶关、潮州、封开、钦州等成为规模较大的造船地。

船舶推动力由篙、桡、橹、桨、棹等进化到兼用风帆可以称得上是一项重要技术进步，尤其是海上航行，所谓“海舟无风不可动也”^[99]“舟轻不可越海”^[100]。从文献记载上看，中国在东汉时期出现风帆，普遍使用则是在东汉末。东汉元初二年（115年），马融上《广成颂》，其中有“张云帆，施蛭旆”^[101]之说，刘熙《释名·释船》曰：“帆，

泛也。随风张幔曰帆。使舟疾泛泛然也。”^[102]曹丕《浮淮赋·序》言：“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运，泛舟万艘。时余从行，始入淮口，行泊东山，睹师徒，观旌帆，赫哉盛矣。”^[103]极言曹操征讨大军树旌挂帆达万艘之众，声势浩大。两汉三国时期，能够运用多桅多帆技术的是外国人，据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载：“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牖形。长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104]从这段记载来看，外国帆船以卢头木叶织为大帆，四帆稍倾斜迎风，并可调整，即使在逆风中船仍能迅速前行。这种船，“外域人名船曰舡，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出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105]。这些记载表明南海已出现大量外国船舶，其中扶南国以善造大型海船而知名，康泰《吴时外国传》载：“伐木为舡，长者十二寻，广肘六尺，头尾似鱼，皆以铁镊露装。大者载百人……”^[106]晋徐衷《南方草物状》曰：“铁出耽兰州，裸夷装船载铁至扶南卖之。”^[107]“裸夷装船载铁至扶南卖之”，可见扶南国铁需求量大，不排除用于造船。

王朝经略岭南促使中央集权体制和文化认同总体上得到加深和扩展，而这个历史进程也伴随着官府豪强侵夺，加之当地复杂的族群关系、较为落后的农业生产，动乱时有发生，与冲突和战争相伴的是战船的建造和运用。东汉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波及九真、日南等地，光武帝随即命“长沙、合浦、交趾具舟船，修桥道，通障溪，储粮谷”^[108]，从马援“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109]来看，平均每船10人左右，可以想见长沙郡、合浦郡所造大多为冒突、蒙冲、弋船等小型战船。唐玄宗时期，南海太守张九皋曾“召募敢勇，缮治楼船，绥怀远人，安集犷俗，或指剑山之路，或出铜柱之乡，以回舶运粮，省泛舟之役”^[110]，张九皋修建楼船等船舶作为战船、漕船。《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天宝二年，（鉴真）仍出正炉八十贯钱，买得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麟之军舟一只，雇得舟人等十八口。”^[111]据《通典》载，唐代战船主要有楼船、蒙冲、斗舰、走舸、游艇、海鹞六种^[112]，这六种战船亦为岭南水军常备。唐元和四年（809年），安南都护经略使张舟“陆联长毂，海合朦艘，再举而克殄其徒”^[113]，大败环王，可见朦艘在水战中十分重要。

汉代岭南还有一种特殊的战船——铜船，据刘欣期《交州记》载：“安定县有越王铜船，潮退时有见者。合浦四十里有潮（疑为‘湖’），阴雨日，百姓樵采，见铜船出水上。”^[114]如其所言不虚，越王曾造铜船，沉于安定县（属交趾郡）。《方輿记》载：“铜船湖，马援铸铜船五只，一留此（指合浦）湖中，四只将过海征林邑。”^[115]马援铸铜船并不只是壮军威，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朱鸢江，北去县一里。后汉马援南征，铸铜船于此，扬排燃火，炙船头令赤，以焦涌浪及杀巨鳞横海之类。”^[116]马援为保证

海上航行安全，于合浦、朱鸢县铸铜船，用火加热铜船，以“焦涌浪及杀巨鳞”，这种做法虽不十分科学，但也具有合理性，水下潜藏未知危险，建戈船是因“越人于水中负人船，又有蛟龙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为名”^[117]。

汉唐时期，岭南地区官方治理、商贸往来、人文交流均与造船、行船息息相关，岭南造船业发展迅速，能够建造独木舟等小船、大中型客（货）船、大型海船以及各种战船，形成了广州、合浦、徐闻、梧州、贵港、韶关、潮州、封开、钦州等规模较大的造船基地，岭南人也较早学习外国运用风帆，因地制宜采用植物纤维捻缝和固定船舶等造船技术。岭南滨海地域有鱼、盐、珠玑、香料之利，平民主要从事捕鱼、煮盐、采珠、采香等，通过对外贸易获取粮食、衣物、酒等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是其生计重要补充。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力量介入，促使滨海地域平民在资源争夺与控制中逐步失去优势，在获取生活资料方式不稳定及朝廷、地方权贵等剥削、掠夺的情况下，滨海地域平民生活境况很差。

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与融合逐步深入，大规模官方移民和民间自发迁入不断影响、塑造岭南社会，无论是官方治理还是商贸、人文交流都离不开造船、行船。汉代，“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118]（越人在暴动前，首先囤积粮草，伐木造船）。朝廷重大政治、军事行动往往由水路开展，“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119]，可见平定海南岛的战役是经合浦、徐闻南海道进击，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离不开“蛮夷贾船，转致相送”^[120]。在日常生活领域，船舶使用也相当普遍，东汉合浦太守孟尝“被征当还，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去”^[121]。“水猪鱼，随海潮搏岸边，食人。人乘船刺之。”^[122]下酒甚是美味的跳鲢鱼，渔人“桨船争前而迎之”^[123]，不用渔网，鱼受惊吓自跳入船。唐代钦州灵山县南“四十里谓之水步，即是钦州北来人溯流舍舟登陆处”^[124]，既然有“水步”之称，足见乘船南徙钦州之人众多。唐末横州刺史郭氏被称为“捉船使君”^[125]，足见其善于操舟。史籍中不乏对岭南等地百舸争流、千帆竞进场景的描述，东汉应场《灵河赋》云“越舸蜀艇，溯浚蔽水，帆柁如林”^[126]，东晋郭璞《江赋》云“溯洄沿流，或渔或商；赴交益，投幽浪，竭南极，穷东荒”^[127]。唐代，“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漕运，私人商旅，舳舻相继”^[128]。一向被认为是落后的“乌浒狼月荒，千艘竞进”^[129]。汉唐时期，在陆路交通不甚便利的情况下，岭南地区内外交往多由水路或水陆兼程，使岭南社会加快了区域交流与融合的进程。

三、外洋奇珍：合浦港的朝贡转口经济

汉唐时期，广州与交州并为中国两大贸易港，广州内河交通活跃，珠江水运和近、

远洋贸易繁盛，同时，作为经略岭南要地，官、私造船业较为发达。1975年发掘的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证实了秦汉之际番禺已拥有相当强的造船能力。由船台现存宽度推算，“1号、2号船台分别可以建造船身宽5~8米、长25~30米、载重25~30吨的大型木船”^[130]。六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进一步发展，“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汎海陵波，因风远至”^[131]，南夷诸国“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初积王府”^[132]。唐代，“广州素为众舶所凑”^[133]，“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安南货易”^[134]，广州所造各类船舶航行各地，广州也不乏世界各地船舶，“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135]。鉴真到广州时，看到“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136]。除广州外，徐闻也是重要港口，作为朝廷经略海南岛和开展内外贸易重要基地，发展造船业十分必要，从徐闻望去，珠崖州如困廩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137]。汉朝廷于徐闻“置左右候官，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138]隋代，潮州（义安郡治）与台湾等地就有贸易、人文交往，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派武贲郎将陈稜“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139]。可见，当时潮州所造海船就已到达台湾等地，而韶州作为战略要地、商贸要津，造船业已颇具规模。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年），车骑将军章昭达督众军征讨欧阳纥，于韶州造战船，直逼浚口（今英德连江口）水栅，后“纵大舰随流突之”^[140]，次年平定。唐会昌末，许浑在韶州驿楼饮宴，看到“檐外千帆背夕阳”^[141]。唐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军攻破广州，转战湘湖间，“广州表（刘）谦为封州刺史、贺江镇遏使，以御梧、桂之西。岁余，有兵万人，战舰百艘”^[142]。南汉白龙三年（927年），“楚人以舟师攻封州，封州兵败于贺江”^[143]，封州是唐五代时期岭南战略要地与战船建造地。

合浦是岭南西部重要港口，也是朝廷经略交趾的战略要地，交州有战事时，合浦也要储存粮草、建造车船、疏通道路，以供南征之需。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年），南诏攻陷交趾，唐朝廷随即废安南都护府，在合浦置行交州。^[144]安南都护高骈于海门筹划南征事宜，咸通九年（868年）在凿通天威遥（即潭蓬运河）后，作《南海神祠》一诗，有“此日征南将，安然渡万艘”^[145]之语。“渡万艘”或许有所夸大，但无疑表明合浦等地所造海船数量之多。明代张国经所修《廉州府志》提到合浦九头岭“其南麓有天妃官，旁有船厂，云昔人于此造海船”^[146]，可见明代以前合浦就能建造海船。南朝后期至唐代前期，钦州宁氏世为本地及周边地区土豪酋帅，隋大业元年（605年）宁贇随驩州道行军总管刘方渡海征林邑，“舶薪壙之江，出寇阨缘之海，贼舳千乘，公舟二十，旭旦帜交，浸宵未止”^[147]。可见海战之激烈，公舟二十对敌千艘以突出敌强我弱，从中可以看出钦州亦能建造海船、组建水师。日本遣唐使判官平郡广成于唐开元

二十二年（734年）由苏州回国，其间遇海上风暴漂流至昆仑国，他记述“有唐国钦州熟昆仑到彼。熟昆仑，归化中国之昆仑人。便被偷载，出来，既归唐国”^[148]，钦州也是岭南西部重要港口。梧州位于浔江与桂江交汇处，为沟通湘漓水道与南流江、北流江通道要地，一直以来都是岭南重要交通枢纽和政治、经济中心，在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至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年）之间更是作为交州刺史部的治所，水运交通便利，官、私造船业也有所发展。建安十六年（211年），孙吴遣步骖为交州刺史，行至苍梧，“步骖杀吴巨、区景，使严舟船，合兵二万，下取南海。苍梧人衡毅、钱博、宿巨部伍，兴军逆骖于苍梧高要峡口”^[149]，可见汉末苍梧造有不少战船。近年来，梧州市北山、云盖山、低山、富民坊、苍梧例水等地出土数量众多的六朝青瓷，“这些器物种类丰富，制作工艺精湛，造型规整美观，质地坚硬，工艺水平高，梧州市出土的六朝青瓷为本地烧制”^[150]。瓷器的运输主要是通过水路，离不开造船、行船。汉代郁林郡（郡治在今贵港）细葛布颇负盛名，“郁林布，比蜀黄润。古称云：‘笥中黄润，一端数金。’《淮南子》云：弱絺，细布也。《汉书》云：白越即此布也”^[151]。贵港凭舟楫之力一直积极参与国内外贸易，南朝萧梁任昉《述异记》云“郁林有珊瑚市”^[152]，珊瑚出于海中，“（大秦）西南涨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153]。应是商人在此地聚集并转运各地形成的专业市场，而运输工具自然少不了大小船舶。唐代张籍《昆仑儿》诗云：“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言语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154]马来半岛等地的昆仑儿远涉重洋经过郁林州，可见此地是岭南水陆交通重要枢纽。

交趾、广州往往是外国船舶抵达中国的首站，岭南人也较早学习外国运用风帆等造船技术。南朝宋沈怀远《南越志》曰，“南海江岸间有卢头木，叶如甘蔗，织以为帆。以其舒畅怀风，故帆不以布”^[155]，与《南州异物志》中外徼人所用为同一材质。除了卢头木叶为帆，岭南等地还有越布帆、蒲帆，齐武帝萧赜曾“乘龙舟游五城江中放观，以红越布为帆，绿丝为帆纤”^[156]。《岭南异物注》曰：“尝有人浮南海，泊于孤岸，忽有物如蒲帆飞过海，将到舟，竟以物击之，如帆者尽破。”^[157]李肇《唐国史补》载：“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自白沙溯流而上。”^[158]蒲帆取材方便，运用地域较广。

岭南地区缺乏铁和桐油，铁钉钉连和桐油填缝技术未得到大范围运用，但岭南较早采用植物纤维捻缝和固定船舶，因地制宜解决了船体渗水问题。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载：“枕榔树实似拼桐，其皮可作纆，得水则柔韧，胡人以此联木为舟。”^[159]胡人概指印度人、波斯人，而枕榔亦为岭南所产，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古南海县有枕榔树”^[160]，周繇《送杨环校书归广南》中有“初著蓝衫从远峤，乍辞云署泊轻艘。山村象踏枕榔叶，海外人收翡翠毛”^[161]之句，可以想见岭南于西晋或随后不久已

经利用枕榔皮缝合木船。唐代广州等地经常停泊巨大波斯船、昆仑船、婆罗门船，释慧琳、释希麟在《正续一切经音义》中描述昆仑船“用椰子皮为索连缚，葛览糖灌塞，令水不入，不用钉鏃，恐铁热火生”^[162]，所谓橄榄糖是橄榄“树枝节上生脂膏，如桃胶，南人采之，和其皮叶煎之，调如黑汤”^[163]。不仅昆仑船，岭南也有“贾人船不用铁钉，只使枕榔须系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也”^[164]。枕榔须、椰子皮、橄榄糖于岭南较为常见，利用枕榔须和橄榄泥缝合船体显然更容易实现。此外，枕榔须、蔴藤等还可用来固定船舶，“枕榔树枝叶并蕃茂，与枣槟榔等小异，然叶下有须如粗马尾，广人采之以织巾子。其须尤宜咸水浸渍，即粗胀而韧。故人以此缚船，不用钉线”^[165]。《异物志》云：“蔴藤，围数寸，重于竹，可以为杖，箴以缚船，及以为席，胜于竹也。”^[166]

“越舩吴艇，不能无水而浮”^[167]，而水上尤其是海上航行难免遇到覆舟、裂舟、漏渗等险情。岭南江河曲折，不乏险滩，连州桂阳县贞女峡水流湍急，“漂船摆石万瓦裂，咫尺性命轻鸿毛”^[168]。“自郴南至韶北，有八泷，其名神泷、伤泷、鸡附等泷，皆危险不可上。南中轻舟迅疾可入此水者，因名泷船，善游者为泷夫。”^[169]险滩急流处大船不得过，需善游者驾轻便泷船冒险通过。宋之问《下桂江县黎壁》中有“舟子怯桂水，最言斯路难”^[170]之言，桂江之险大概在平乐至梧州段，“自昭而下至梧，多锐石，滩高而水湍激，两岸皆悬崖峭壁”^[171]。南流江流经博白西南有马门滩，《元丰九域志》载：“马门滩，马援南征，以江流迅激，舟楫不通，乃疏作尽去其石，余有二巨石，双立若门，因谓之马门，如奔马。”^[172]此滩一直威胁过往船只，高骈南征得胜，自合浦北归，经马门滩时，“峻险不可行，又中伏巨石，骈因留俸钱，遣海门防遏使杨俊营治之”^[173]。海上航行风险更大，风浪、暗礁往往不可避免，遇到极端天气容易迷失方向，虽财利所系，船民仍有“才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计”^[174]之感。汉代州刺史的职责之一是巡行诸郡、县，检核吏治民风，而交州刺史惮于风浪，“旧刺史行部，不渡涨海”^[175]。唐代，“交趾回人，多舍舟，取雷州陆岸而归，不惮辛苦，盖避海鯨之患也”^[176]。可见交广海道有鲸鱼覆舟之险，交趾商旅回程不乏水陆兼程者。北部湾沿海一带同样风大浪高、暗礁无数，据李商隐《为荥阳公论安南行营将士月粮状》载：“又当管去安南三千余里，去年五月十五日发遣，八月二十日至海门遭恶风，漂溺官健一十三人，沉失器械一千五百余事。其年十二月六日差纲某等般送酱菜、钱、米，今年五月八日至乌雷又遭飓风，打损船三只，沉失米五百余石。”^[177]从广州运送粮食、酱菜等补给至安南的军事行动由于在合浦、钦州遭受大风，损失较为严重，且严重迟滞。在高骈未修凿天威遥及疏浚交广海道前，“南海至交州有石隐水中，尝覆舟”^[178]。宋代，“安南舟楫多至廉，后为溺舟乃更来欽”^[179]。可见广西北部湾海道艰难，舟船沉溺风险很高。

岭南地区拥有众多奇珍异宝，向来为人所熟知。秦始皇征讨越人，就有“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玕”^[180]的因素。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玳瑁）、珠玕、银、铜、果布之凑”^[181]，“苍梧、郁林，道易利通，元龟象齿，宝贝南金”^[182]。汉末，占据交州的士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琉璃）、翡翠、璆（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183]。韩愈《送郑尚书序》载：“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雨之灾，水旱疠毒之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184]以上提及的奇珍异物除银、铜外，大多为岭南滨海地域所产或所见。《西京杂记》曰：“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上遗合浦圆珠珥。”^[185]可见合浦珍珠自西汉以来就被认为是稀世珍品。合浦珍珠产于近海，晋代刘欣期《交州记》云：“合浦十八里有围州，周围一百里，其地产珠。”^[186]岭南滨海地域多林木，不乏拊香、栈香、沉香等植物香料，《南方草木状》曰：“拊香，茎生，出乌浒。”^[187]《岭表录异》言：“广管罗州多栈香树。”^[188]唐太宗曾经询问高州首领冯盎，“卿宅去沉香远近，对曰‘宅左右即出香树，然其生者无香，惟朽者始香矣’”^[189]。可见高州朽木可为沉香，岭南世居之民颇得其法，据竺法真《登罗山疏》载：“沉香，叶似冬青，树形崇竦。其木枯折，外皮朽烂，内乃香。山虽有此树，而非香所出。新会、高凉土人，斫之经年，肉烂尽心，则为沉。”^[190]丁谓《天香传》载：“雷、化、高、窦亦中国出香之地，比海南者优劣不侔甚矣。”^[191]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载：“沉香木，岭南诸郡悉有之，濒海诸州尤多。”^[192]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香”一则称：“世皆云二广出香，然广东香乃自舶上来，广右香产海北者亦凡品，惟海南最胜。”^[193]可见雷、化、高、窦、廉等州沉香木品质略低于海南、占城、真腊所产。除植物香料外，岭南滨海多甲香，甲香为蝶螺及其近缘动物的壳盖，苏颂言：“海螺即流螺，庵日甲香，生南海。”^[194]甲香多为合香用，“善能管香烟，与沉、檀、龙、麝用之俱佳”^[195]，甲香能聚集烟气，使各种香料挥发均匀。

- [1]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六六《地部三·湖》引《交州记》，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4页。
- [2]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五《赋丙·京都下·吴都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06页。
- [3] [唐]李延寿：《南史》卷五一《梁宗室·萧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77页。
- [4] [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
- [5]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一〇〇〇《百卉部七·苔》引《异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424页。
- [6]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9页。
- [7]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28页。
- [8] [西晋]司马彪：《续汉书》志二八《百官志五》，第3625页。
- [9]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四《岭南道一·潮州》，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95页。
- [10] [唐]段公路纂：《北户录》卷二《红盐》，《丛书集成初编》第302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页。
- [11] [北宋]乐史编《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七《岭南道一·广州》，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021页。
- [12]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二六九《胡淞》，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112页。
- [13] 同[12]，卷八六五《饮食部二三·盐》引《岭表录异》，第3841页。
- [14]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四一《张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725-726页。
- [15] 同[14]，卷一四《州郡志上》，第269页。
- [16] [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九《广南路》，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36页。
- [17]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九《论灾》，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56页。
- [18] [北宋]乐史编《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七《岭南道十一·钦州》，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01页。
- [19] 同[18]，卷一五八《岭南道二·恩州》，第3039页。
- [20] 同[18]。
- [21] 引自[北魏]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一〇《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薯》，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728页。
- [22] [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 [23]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七八六《四夷部·乌浒》引杨孚《异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480页。
- [24]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六《孟尝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73页。
- [25]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七《陶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61页。
- [26]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八《岭南道五·陆州》，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62页。
- [27] 同[18]，卷一六九《岭南道十三·太平军》，第3227页。
- [28] [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卷一九，[宋]曾三异《同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52页。
- [29] [唐]刘恂撰，商壁、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卷下“蚝”条，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69页。
- [30]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九四，施肩吾《岛夷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592页。

- [31] [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卷三，郑熊《番禺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0页。
- [32]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六四《岭南节度使韦公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943页。
- [33]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76页。
- [34] [西晋]陈寿撰，[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五《吴书·华覈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65页。
- [35]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〇《卢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36页。
- [36] 同[29]，卷上“卢亭”条，第60页。
- [37] [唐]李延寿：《南史》卷五一《梁宗室·萧励》，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62页。
- [38]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纪四二》“德宗建中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20页。
- [39]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波斯国》，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13页。
- [40]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29页。
- [41] 同[38]，卷二〇三“武后光宅元年”，第7284页。
- [42] 同[40]。
- [43] 同[40]，第6330页。
- [44] [北宋]乐史编《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七《钦州》，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01页。
- [45] [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汉世家·刘晟》，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6页。
- [46]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0页。
- [47]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三一《贾琮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11页。
- [48]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九四〇《鳞介部十二·黄鱼》引《南方草物状》，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175页。
- [49] [西晋]陈寿撰，[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薛综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52页。
- [50]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八四《珠宝部下》引万震《南州异物志》，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438页。
- [51]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七《陶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61页。
- [52] [北宋]王钦若等纂，周勋初等校点《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二五《帝王部·符瑞》，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248页。
- [53] [唐]刘恂撰，商璧、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卷上“廉州珠”条，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 [54]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九八，王建《海人谣》，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383页。
- [55]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五八《韦皋附韦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37页。
- [56]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九《宝货门·珠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59页。
- [57] [唐]杜佑：《通典》卷一〇《食货典》“盐铁”，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31页。
- [58] [西汉]焦延寿撰，尚秉和注，常秉义校《焦氏易林注》卷五“随之节”，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178页。
- [59]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七六《王章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39页。
- [60] [明]张国经修，郑抱素纂《（崇祯）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廉州府部》（一），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148页。
- [61] [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文馆词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44页。
- [62] [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二四《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73-674页。

[63] 同[61], 第 247 页。

[64] [北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二六《赋》,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年, 第 118 页。

[65]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一《原道训》,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年, 第 38-39 页。

[66] [东汉]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 乐祖谋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第 58 页。

[67] [南朝梁]萧统编, [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五, 左思《吴都赋》,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年, 第 114 页。

[68] 同[67], 卷五三, 陆士衡《辨亡论》注引繁钦《辨惑》, 第 988 页。

[69] [东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六四《严助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年, 第 2778 页。

[70]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九五七《木部六·桂》引晋郭义恭《广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年, 第 4249 页。

[71]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二二《乐志四》,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年, 第 641 页。

[72]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一九, 陆龟蒙《引泉》,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年, 第 7132 页。

[73]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九六〇《木部九·榘》引《交州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年, 第 4260 页。

[74]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木部卷三五“柯树”条引《广志》,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5 年, 第 2050 页。

[75] 同[74], 卷三四“钓樟”条, 第 1948 页。

[76] [北魏]贾思勰著, 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一〇《五谷果蔬菜茹非中国物产者·梓椌》,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8 年, 第 876 页。

[77] [南宋]周去非著, 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六《器用门·柅》,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年, 第 220 页。

[78] [东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年, 第 3839 页。

[79] 富霞、熊昭明、蒙长旺:《广西贵港马鞍岭梁君垌汉至南朝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 年第 1 期, 第 67-107 页。

[80]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第 427 页。

[81] 同[72], 卷五七一, 贾岛《送张校书季霞》, 第 6626 页。

[82] [南朝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三三《郑弘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年, 第 1156 页。

[83]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九五《酈生陆贾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年, 第 2695 页。

[84]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本纪》,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年, 第 625 页。

[85] 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年, 第 7 页。

[86] [北宋]王谠撰, 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年, 第 727 页。

[87]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八二《草部下·藤》, 汪绍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第 1414 页。

[88] [南宋]周去非著, 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六《器用门·剡木舟》,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年, 第 219 页。

[89]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七《陶璜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年, 第 1559 页。

[90]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八一三《珍宝部十二·铁》,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年, 第 3614 页。

[91]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四《岭南道一·广州》, 贺次君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年, 第 889 页。

[92] 同[88], 第 218 页。

[93] [唐]刘恂撰, 商壁、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卷中“罗浮山竹”条,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8 年, 第 97-98 页。

- [94]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五一《王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60页。
- [95]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四二《王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08页。
- [96] [北宋]王澆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27页。
- [97]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纪四二》“德宗建中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286页。
- [98] [宋]戴埴：《鼠璞》卷上《防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页。
- [99]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八《兵考十·舟师水战》，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81页。
- [100]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陆龟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13页。
- [101]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七七一《舟部四·帆》引《南州异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419页。
- [102] [清]王先谦撰集《释名疏补证》卷七《释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81页。
- [103] [唐]徐坚等：《初学记》卷六《地部·淮》，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8页。
- [104]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七七一《舟部四·帆》引《南州异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419页。
- [105] 同[104]，卷七六九《舟部二》引《南州异物志》，第3412页。
- [106] 同[104]，卷七六九《舟部二》引《吴时外国传》，第3411页。
- [107] 同[104]，卷八一三《珍宝部十二·铁》引《南方草物状》，第3614页。
- [108]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36页。
- [109] 同[108]，卷二四《马援列传》，第839页。
- [110]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五五，萧昕《唐银青光禄大夫岭南五府节度经略采访处置等使摄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殿中监南康县开国伯赠扬州大都督长史张公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599页。
- [111] [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汪向荣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7页。
- [112] [唐]杜佑：《通典》卷一六〇《兵典·水平及水战具》，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122-4123页。
- [113]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50页。
- [114]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七六九《舟部二》引《交州记》，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412页。
- [115] 同[114]，卷六六《地部三·湖》引《方輿记》，第316页。
- [116]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八《岭南道五·鸞县》，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58页。
- [117] 同[114]，卷三五五《兵部八二·戈》，第1616页。
- [118]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六四《严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81页。
- [119] 同[118]，卷二八下《地理志》，第1670页。
- [120] 同[118]，卷二八下《地理志》，第1671页。
- [121]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孟尝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73页。
- [122] 同[114]，卷九三九《鳞介部十一·水猪鱼》，第4171页。
- [123] [唐]刘恂撰，商壁、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卷下“跳鯪”条，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39页。
- [124]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八《岭南道五·钦州》，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53-954页。

- [125] [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卷三, [宋]马永易《实宾录》,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 第57页。
- [126] [唐]虞世南辑录《北堂书钞》卷一三七《舟部上》, 北京: 中国书店出版社, 1989年, 第560页。
- [127] [南朝梁]萧统编, [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一二《赋》,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年, 第243页。
- [128] 同[124], 卷五《河南道一·河阴县》, 第137页。
- [129]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七二, 张鷟《波斯昆仑等舶到拟给食料已前隐没不付有名无料虚破官物请停》,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年, 第1757页。
- [130] 王子今:《秦汉时期的船舶制造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1期, 第156-164页。
- [131]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九七《夷蛮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年, 第2399页。
- [132]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八“史臣曰”,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年, 第1018页。
- [133] [北宋]司马光编著, [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唐纪五十》“德宗贞元八年”,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年, 第7532页。
- [134] 同[123], 卷下“海鳅”条, 第154页。
- [135] [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 第63页。
- [136] [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 汪向荣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年, 第74页。
- [137] [北魏]酈道元著, 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六《温水注》引《交广春秋》,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年, 第840页。
- [138]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逸文”, 贺次君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年, 第1087页。
- [139] [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六四《陈稜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年, 第1519页。
- [140] [唐]姚思廉:《陈书》卷一一《章昭达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年, 第183页。
- [141]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五三四, 许浑《韶州驿楼饮罢》,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年, 第6104页。
- [142]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五八《南汉一·烈宗世家》, 徐敏霞、周莹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年, 第835页。
- [143] [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汉世家·刘龔》,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年, 第812页。
- [144] 杨希义:《唐代行交州海门镇所在方位考辨》,《学术论坛》1983年第5期, 第78-79页。
- [145] 同[141], 卷五九八, 高骈《南海神祠》, 第6918页。
- [146] [明]张国经修, 郑抱素纂《(崇祯)廉州府志》卷二《地理志》, 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廉州府部》(一),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9年, 第31页。
- [147] 刘传喜、彭兴林编著《中国名碑全集》卷一一《宁贇》,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13年, 第253页。
- [148] [日]菅野真道:《续日本纪》卷一三“圣武天皇天平十一年”, 东京: 讲谈社, 1995年, 第389页。
- [149] [北魏]酈道元著, 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六《浪水注》引《交广春秋》,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年, 第872页。
- [150] 黄贵贤、梁萍:《浅谈广西梧州市出土的六朝青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2期, 第106-109页。
- [151] [北宋]乐史编《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六《岭南道·贵州》, 王文楚等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年, 第3179页。
- [152]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八〇七《珍宝部六·珊瑚》,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年, 第3586页。
- [153] [唐]杜佑:《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大秦》, 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等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年, 第5265页。
- [154] [唐]张籍:《张籍诗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年, 第54页。
- [155]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九六一《木部一〇》引《南越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年, 第4266页。
- [156]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八《清商曲辞五》,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年, 第699页。

- [157] 同[155]，卷九四五《虫豸部二·蝴蝶》引《岭南异物注》，第4197页。
- [158] [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2页。
- [159] [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页。
- [160]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十《支植下》，方南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6页。
- [161]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三五，周繇《送杨环校书归广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292页。
- [162] [唐]释慧琳、[辽]释希麟：《正续一切经音义》卷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451页。
- [163] [唐]刘恂撰，商璧、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卷中“橄欖”条，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15页。
- [164] 同[163]，卷上“贾人船”条，第54页。
- [165] 同[163]，卷中“枕榔树”条，第105页。
- [166] [北魏]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一〇《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菘藤》，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813页。
- [167]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二《俶真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63页。
- [168]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三八，韩愈《贞女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788页。
- [169] 同[168]，卷四八〇，李绅《逾岭峤止荒陬抵高要》，第5463页。
- [170] 同[168]，卷五一，宋之问《下桂江县黎壁》，第624页。
- [171] [南宋]祝穆撰，[南宋]祝洙增订《方輿胜览》卷四〇《广西路·昭州》，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732页。
- [172] [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九《附录》，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05页。
- [173] 马蓉、陈抗、钟文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一册《郡县志·梧州府》，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4页。
- [174] [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二《高骈开海路》，贾二强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6页。
- [175] [汉]谢承：《后汉书》卷六《陈茂传》，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08页。
- [176] [北宋]乐史编《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岭南道十三·雷州》，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30页。
- [177] [唐]李商隐、李贺：《李商隐全集附李贺诗集》卷一《状》，朱怀春、黄光甫、高克勤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25页。
- [178] [越南]黎崱：《安南志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99页。
- [179]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边帅门·钦廉溪峒都巡检使》，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六编·三，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53页。
- [180]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一八《人间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89页。
- [181]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0页。
- [182] [西汉]焦延寿撰，尚秉和注，常秉义校《焦氏易林注》卷三“比之噬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83页。
- [183] [西晋]陈寿撰，[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九《吴书·士燮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92-1193页。
- [184] [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翼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84页。
- [185]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七一八《服用器二十·瑇瑁》引《西京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83页。

[186] [北宋]乐史编《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岭南道十三·太平军》，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29页。

[187] 同[185]，卷九八二《香部二·栝香》引《南方草木状》，第4348页。

[188] [唐]刘恂撰，商壁、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卷中“栈香”条，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17页。

[189] [唐]刘餗：《隋唐嘉话》“补遗”，程毅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8页。

[190] 同[185]，卷九八二《香部二·沉香》引《登罗山疏》，第4239页。

[191] [明]周嘉胄：《香乘》卷二八《香文汇》，雍琦点校，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435页。

[192]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六一《沉香二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12页。

[193] [南宋]范成大撰，齐治平校补《桂海虞衡志校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9页。

[194]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介部卷四六“海螺”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第2546页。

[195] [宋]寇宗奭：《本草衍义》卷一七“甲香”条，颜正华、常章富、黄幼群点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第128页。